



私下里朋友相聚，

谈及张五常教授的狂傲，

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

学问如斯，文章如斯，

阅历如斯，焉能不做？

我所知道的 张五常

那些我熟悉的经济学家

王玉霞 著

我很钦佩张教授的傲慢表面化，生命只有一次，贵在真实潇洒，终日戴着面具，即便是八面玲珑，有口皆碑，那也是虐待了生命，辜负了年华，天下不乏这样的傻瓜。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我所知道的

那些我熟悉的经济学家

王

王玉霞◎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张五常/王玉霞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86-1969-9

I. 我… II. 王… III. ①张五常—生平事迹②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K825. 31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365 号

我所知道的张五常

WOSUOZHIDAODE ZHANGWUCHANG

著 者: 王玉霞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969-9/F · 1928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我不是三毛，缺乏她那份潇洒。我那实在一般化的名字，在大陆经济学界或许有几儿记得，而在港澳台地区则注定无人知晓。我以为读者看见这本书时，十有八九会问：谁是王玉霞？我有着在同胞眼里分量不轻的博士、教授的光环，再加上华人经济学一代宗师张五常教授的力荐，更容易让读者误会我的背景和出身。因此，不和读者交代清楚，终有几分不忍。光环下面有泡沫，实在是一串串的机缘让一个普通的女子走到了你们的面前。

一、童年时光

1956年10月1日，伴随着欢庆建国13周年的锣鼓，我来到了人间。母亲常对我说：“你出生时，庆祝的队伍刚好从家门前走过。”踩着鼓点出生的我，总是多几分幸运。

在我出生前，已经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幼年夭折，我

篡位排行老二。不知是父母重男轻女，还是孩子太多（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出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名字，父母和家人只称我为“崽”。“崽”不专属于人类，更不专属于我，母亲和姥姥喊我“崽儿”或“小崽”；而父亲口中的一声“小崽子”更是极其刺耳，让我苦不堪言。这个无名的孩子，上学后因为姐姐叫“彩霞”，便顺成了“玉霞”。尽管成绩极其优秀，却始终有把柄在同伴手中。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在和一群捣蛋的男生发生冲突时，只要人家一二三齐喊“小崽子”，我便羞愧难当，败下阵来。

我不明白，父母怎么可以这么粗心，就算孩子再多，也不该如此草率，为什么不动动脑筋，给孩子起一个伴随他（她）一生，或文雅或响亮、富有意蕴的名字呢？我的父母完全有这个能力！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因寻找一位保姆，我来到父亲的老家。一进门，本家婶子的一声“崽儿来了”竟让我泪水盈盈。多少年我没有听到这个乳名了，这让我想起彭丽媛唱的《父老乡亲》：“一声声喊我乳名，多少亲昵、多少疼爱、多少开心……”或许父母是对这个女儿格外疼爱和怜惜（这是事实）才取名为“崽”？

待到中学时，我靠自己优异的成绩走出了名字的阴影。我的家乡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当时我所在的年级有12个班，每个班有50~60名学生，毫不夸张地说，在七八百名学生中，我的功课门门全年第一。在那个不正常的年

代，我几乎没学到什么（每周一、三、五半天上课，经常背毛主席语录）。从小学到中学我一共写过十几篇作文（是在儿子两个多月的任务量），在“八股文”盛行的时代，老师对我的文章篇篇爱不释手。记得语文老师周泽东这样朗诵我的一篇文章：“晚秋，天气越来越冷了。”然后他抬起头来对同学们说：“你们听听，她没有写‘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那个年代，有太多的文章是以后者为首，睁眼说瞎话说成了统一的模式。

我的数理化成绩也格外出色，无论是哪个老师教我，我大多是年级里仅有的百分。有一次邻班的苏老师对我说：“我真想把你的脑袋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期待着考试，可惜这种能让我脱颖而出的机会太少了。

学习成绩优异，不等于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没有弹过琴、画过画，没有学过地理、历史、哲学及书法。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且有学工学农的任务。在那个苍白的岁月，我只是东找西寻地多看了一些中外小说，算是比同龄人多了一点儿文学素养。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劫数未尽，我已高中毕业了。随着毛主席一声号令，我们又成了插队的知青——“青”是真的，“知”则徒有虚名。

十年浩劫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直至今日，我的天文、地理、自然、历史知识均在儿子之下，哲学、逻辑也是一知半解。当有人夸我经济学散文写得纯净时，我心里苦

笑：十八般武艺只会一种，焉能不纯。

我的童年没有零食，没有玩具，父亲被关进牛棚，家里数次被抄；然而同时，我却有那种鹤立鸡群的骄傲，有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有老师对我由衷的喜爱，有可以在一起疯跑的玩伴。我的童年，阳光灿烂。

二、知青岁月

我的知青生涯远没有同胞们听说或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下乡时已是“文革”末期，关于知青的安排、待遇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况且那时实行的是对口下乡，即以父母的单位来组织下乡。父亲当时任第二轻工业局局长，为了避嫌，我随母亲的单位银行系统的子女来到了离家仅 15 公里的木里图公社。

农村确实大有可为，原因是缺少文化，因此我那点儿舞文弄墨的本事立即被派上了用场。那个年代，批林批孔，抑儒扬法，批邓批宋江，今天总结，明天汇报，文章有的写；再加上编快板、出墙报、赛诗会，处处能发挥我的长项。在那个广阔的天地中，我仍旧出色，仍旧风光。因此我对知青生涯不但没有半点惧怕，反而有几分留恋。当父亲一声令下召我回城准备考大学时，我竟犹豫再三。时至今日，我仍然有这个想法：若那批知青不回城，中国的农村要大大地好过今天。

老人家让青年人在读书最佳的时光去务农，肯定是错，

然而又一窝蜂地将他们召回来，是不是错上加错？插队两年半，我深知那片文化的荒漠是多么渴望知识的甘泉。

下乡插队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让我对农民的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亲临农村，不和他们朝夕相处，是决然体会不到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经历的苦难的。拔麦子，我曾累得无法起床；沤大麻，实际就是把自己浸泡在粪坑中。如此劳作，食不果腹不说，社会地位还极其低下。不知这世界上哪个角落还有人比中国农民遭受的歧视更多。下乡两年半，我经常被姥姥骂“败家”。姐姐下乡，粮是粮、钱是钱，使家里的财政发生了转变；妹妹下乡无粮无钱，且要家里贴钱，原因是妹妹太傻，响应号召从富队转插到了穷队。在那里，一个妇女做鞋，一尺长的鞋口布要接三截；一个老人临终前就想喝一碗鸡蛋羹；一个青年帮我们杀猪，一顿吃下一盆肉——面对这些，她能不倾其所有吗？

我转插的穷队叫郭家屯，因为穷，所以被称做木里图公社的“小台湾”（台湾同胞在当时的宣传中一直被形容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公社领导对“小台湾”伤透了脑筋，几番派能人去，均无法改变当地人每个劳动日只挣几分钱的惨状。无奈之中领导们打起了知青的主意，号召知青报名去“解放台湾”。报名的场面十分感人，知青们个个摩拳擦掌，宣誓请战，豪情万丈。但待两个月后真正落实时，绝大多数都退避三舍、止步不前了，毕竟对本身就不富裕的知青来说，这10多倍的收入差距的账是不能不算的。我当然也不

愿意去，但既然报了名，刀山火海也只好闭眼一跳了。和我一起跳的还有一女两男。

当时郭家屯 30 岁以下的小伙子全是光棍，足以说明当地的贫困程度。我在郭家屯任团支书，副手是一个当地青年，他不知用什么招数，从山东老家“拐”来个媳妇，有了零的突破。我们知青每人送他 20 元钱后，我又借给他 30 元钱。就因为这 30 元钱，这个和我并肩作战、“解放台湾”的战友在我临走时竟避我不见——30 元钱便买断了自尊和情谊，贫穷多么的可怕！

这段下乡的经历将我与农民的感情融入了我的血液。农村来的保姆、民工受到我由衷的礼待；对农村出身的同事，我格外敬重。在我撰写的《理性索酬举报》、《法律上的笑话与经济学的不公》、《解读温州企业家》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我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

家乡的农民——我的父老乡亲，什么时候能让我了无牵挂？

知青生涯中，我还差点儿与文学结缘。由于我编导的文艺节目在县里汇演中获了奖，1975 年年底我被邀请作为农民文艺评论家去参与评论地区的专业文艺创作。我去报到的那天晚上，文人墨客正在联欢，一个诗人将全场的人名以诗串联，点到谁，谁就要表演节目。作家们人人能歌善舞，身手不凡。我坐在角落里悄悄地观看，忽然听见那个诗人将我的名字编入了诗中。由于我唱歌跳舞的天赋近乎于零，无奈之下，我只好拿出农村赛诗会的本事，不用纸笔，不讲平仄，

顺嘴胡诌。我记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鲁班檐下怯弄斧，诗人面前吟诗难。今晚乘兴歌一首，不负期望待明天。”自己话音一落，全场哗然，作家们议论纷纷——“诗人面前吟诗难”这样切合时宜、具有哲理的句子即使是朝思暮想，能写出尚属不易，而竟然轻而易举就从一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嘴里溜了出来！那可是一个人们惯作“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岁月啊！第二天我就荣升为诗歌组组长，领导着平均大我20岁的作家们。我接下来的表现使这些作家相信他们看见了一颗文坛新星。

然而时隔两年，这颗新星非但没有星光璀璨，反而莫名其妙地跑到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去和与文坛风马牛不相及的数学符号打交道去了。

三、我的大学

我的母校——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现为内蒙古民族大学）——恐怕除了内蒙古人之外，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了。内蒙往往让人感到偏僻落后，民族学院又总得打点折扣，师范生那时绝非优等生的选择，我何以“沦落”至此？

我是77级的，即“文革”后首批经过统一考试录取的大学生。十年浩劫，十年没有高考，闸门一放，波涛汹涌。离高考还有十余天，我被父亲强令召回，对于如何报考一头雾水。问老师，老师说“你能考上任何一所大学”；问父母，答曰“弄上一个就行”，因此我就报了一个最高的——北京

大学和一个最低的（当然也是离家最近的）——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至于专业，我最敬佩的语文老师周泽东坚决反对我学文，他说文科以社会为课堂，不用在大学里学。不是文就是理，而理当然以数学为先，况且我的数理化本来也是全年级第一（其实我也不知还有那么多的专业）。然而我高估了自己，毕竟中学学的东西太少，再加上我又在农村待了将近三年，最终我以几分之差梦断北大，剩下的就是最差的了。后来我有机会伫立在未名湖畔，泪光闪闪，那是我心中的圣地。

一入学，我便淡漠了怀才不遇的感觉。全班 40 余名学生，可谓藏龙卧虎、高人云集。以后我虽然又在华中工学院（1988 年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 年与其他院校合并成“华中科技大学”）及东北财经大学就学与工作，但我见过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仍然是我在师院数学系的同学。班上近一半的学生已年过 30，相当一部分是天津、北京、浙江的老三届知青。其中有个同学叫王世坤，从入学便被学校以月薪 40 元聘为教师（讲授复变函数）。此君课可以不上，但试绝不能不考，每到考试，他便拿张纸进门，无论考什么（包括教育学）均是全班第一。王老兄最后终在拓扑学领域有所建树，有论文在国内一流数学杂志上发表。

有一次我与一位师兄雪中漫步，他忽然灵机一动说，咱们将古今中外关于雪的名句说一说，你一句我一句，看谁先败。于是乎，我挖空心思，抢先把最容易的说出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

吴万里船”……到最后，“燕山雪花大如席”，甚至连《红楼梦》中的“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也冒了出来。整整半个多小时，我俩居然没分出胜负。那位老兄长叹一声，“这么偏僻的地方竟能生出个你”，接着又说：“你没什么了不起，仅有几根半径和我一般长，而我是个圆。”我是半径他是圆，虽然有点儿夸张，但在这些经过正规高中教育，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文史哲、数理化样样精通的才子面前（这些才子大多因出身不好，在内蒙古农村务农 10 年左右），我再也没有中学时代那种一览众山小的骄傲。

数学系的教师同样学问不俗。我们学校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当时是内蒙古东部仅有的高校，其教师多是名牌大学毕业后流放到塞外的、可以教育好的人的子女。系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师资，对首届凭考试入学的学生予以精心培养。为 77 级数学系汉班讲课的教师现大多已调往名校。因此虽然学校名气不大，但在 4 年中我却受到了严格的数学理论训练，这为我后来理解、讲授现代经济学助益匪浅。内蒙古那黄沙飞扬的故土，是我永远的眷恋。

1982 年春天毕业分配。我尽管毕业成绩优秀，但由于来自内蒙古，自然与高校无缘。后来我被分到吉林长春一家中等专科学校，并马上就被派出学习。1982 ~ 1984 年整整两年，我的生活、学习都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大学，我不间断地读了 6 年。

在华中工学院管理工程系学习的两年，我有两个收获：第一，我所学的管理工程专业是我日后迈向经济学的跳板，

没有这个跳板，也许我会和数学终生为伴；第二，楚地悠久厚重的文化、华中工学院如诗如画的校园，以及著名教育家朱九思校长领导下的严谨的校风、学风均让我获益匪浅。每逢节假日，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与同学一起骑自行车沿磨山东湖兜圈。武汉大学的古色古香，东湖的水天一色，春日菜花黄、秋天桂花香，以及古人遗迹、民间传说，都让我这个北方女孩儿感到格外新鲜。

大学6年，我领略了北国的豪情和南国的浪漫，两所大学以其不同的校园文化滋润着我的心田，豪情与浪漫也无声地潜入我的笔端。

四、“创收”的快乐

从武汉归来一年后，我调入了东北财经大学物资管理系任教。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教师囊中羞涩，生活悠闲，大家都在喝清汤寡水的大锅粥。每周有四节课便是多的，而教多教少、教好教差都没有人过问。更有相当多的教师是半年有课半年闲，除每周三下午到系里点卯，什么事儿也没有。当然工薪也是少得可怜，我与先生均月收入不足百元，近有小儿待哺，远有双亲应孝，囊中空空，很难生活得尊严体面。还记得我经常是傍晚去菜场购买堆菜。两名大学教师养一个孩子尚如此费劲，真羡慕当年李大钊先生，一人教书，夫人打理家务，养一群孩子，还有余款资助学生。

穷则思变。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校园掀起了“创

收”的浪潮。学校领导思想解放、政策宽松，而市场经济对财经教育的需求更是经久不衰，因此东北财经大学以办学为手段的“创收”大潮较其他院校益发波澜壮阔，在风口浪尖上摔打出“创收精英”的大名。1998年前，若有人到东北财经大学打听王玉霞，十有八九的回答是“能办班，善赚钱”，有人干脆送我一个外号——“办班专业户”。1998年经济系成立，系主任费尽口舌要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擅长“创收”，哪知道我已“金盆洗手”另谋他路了。

我来自内蒙古通辽市，在大连举目无亲，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因此办班赚钱与其他老师相比没有半点优势，所有的就是行动。认真负责，诚实守信，吃苦耐劳，服务至上。而一旦登上办班这条船，就像进入了一个自我强化的网络系统，学员源源不断，想抽身都难，很长时间我都陷入办班这种“鸡肋”的困惑中。

我办学的秘诀，第一是积极行动。我内心深处总有这样的理念：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994年东北财经大学面临院系调整，物管系将不再存在，因此人心惶惶，学校号召各系举办大专专业证书班的通知无人问津。期限的最后一天，我拿起通知，先到大连市物资局签个协议，讲好和他们三七分成，由他们招收学员，再给老师们作动员，介绍一个学员推荐费200元（通常为100元）。就这样，这种班我一办就办了整整6年。

谈到办学，我的第二个秘诀是吃苦耐劳。我办学的足迹南至江西、北至满洲里，东北三省及山东更是不在话下。有

一次我将班办到了中、蒙、苏三国交界的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从满洲里下火车，还要在草原上颠簸六七个小时才到目的地。这样的历程我重复了4次。当我将同事请到那儿时，同事对我说：“这是什么鬼地方，遍地黄金我也不会来第二次了，你居然跑了这么多次。”

办班是为了赚钱，但却要看淡金钱，这也是我办学的第三个秘诀。我身边不乏因为看重金钱而弄得身败名裂的实例。应该说我是少有的幸运者，长期办班而没有将自己搞臭，且将我领导的教研室办成了一个凝集力非常强的集体。办班离不开利益的分割。与合作伙伴有分成的问题，与学员有服务的问题，与讲课教师有一个费用问题，与教研室成员也有一个秋后分红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我经受住了考验。有很多的机会，我可以将钱放进自己的腰包，但我却没有那么做。2000年元旦，东北财经大学校方唯一的女领导穆青教授对我说：“王玉霞，你当年办班就是学者风范。”

办班的收益不止于钱，其副产品有如下几点：其一一是了解社会。学校科研经费紧张，学者、教授难得有机会了解社会。办班集赚钱、社会调查于一体，收益良多。不到内蒙古你就不可能知道，还有一个县城连土路都不通；不到黑龙江你就不可能知道，林区的工人因资源枯竭在退林还田（逆向选择），而这些偏僻的地方，若没有我们这种游击队式的办学，注定是不会知道大学教师为何物的。其二，数年办班的实践锻炼了我市场开拓、内部管理及组织协调的能力。办班

很难，上有教委、人事局及学校成教部门的规管，下有从南到北诸多学员的各种要求，我必须方方面面考虑周全。教室的租用、课程的安排、学员报名填表、资格验证、成绩上册、发放证书，各个环节繁琐而杂乱。当我一个人将这本应3~5人承担的任务搞得井然有序时，心里也有一种成就感。其三，办班加深了同事间的感情。大学教书属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同事之间的接触十分有限。办班，特别是异地办班，拉出一个队伍，朝夕相伴，趣事不断，能够加深同事间的了解及感情。我们曾一起在内蒙古的达赉湖畔，穿着蒙古袍，和当地人一起用湖水煮新鲜的羊肉，味道格外鲜美；我们曾一起走进原始森林，古树参天，野花遍地，空气格外清新。有一次到江西九江办学，我们教研室全体人马夜宿庐山，天降小雨，气温转寒。清晨，我起床跑到牯岭镇给每人买了一件腈纶毛衣，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年近七旬的杨学琪教授振臂呼出：“教研室主任万岁！”时至今日，昔日的教研室虽早已解体，却始终“阴魂不散”，其8名成员中，有一人已当上东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两个当上了院长，另外有两人下海经商。每当我们欢聚一堂、回首往事时，都认为那段南征北战的创收岁月是最难忘、最开心的时光。而我的一个功绩，是带领他们富了起来。

数载“创收”，殚精竭虑，其收入尚不足香港大学教授甚至讲师一年的工薪。然而，这不多的原始积累加上后来的繁衍生息，使我的公婆临终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使我的父母搬进了宽敞的楼房，使我的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让我

有能力资助一个堂弟、一个表弟读完中专。有钱可以做到出门打的、外出就餐从容不迫；有钱可以做到闭门读书、一心向学、毫无杂念。

有钱的滋味，真好！

五、灵魂的家園

无论办班怎样的快乐，我内心深处仍然对学问有着由衷的向往。“红袖添香夜读书”，我不敢奢望夜读，却想自己做那个添香的红袖。于是我动员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理由有三：其一，专业对口。先生是东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硕士，继续读产业经济学博士非常自然。其二，导师同意。先生读硕士时的导师现为该专业的博导，对先生既了解又喜欢。其三，在高校任教，学位是必要的包装，没有此物，再好的商品也难免被打点折扣；且在本校就读，机会成本不高。为了让先生动心，我提出两个优惠条件：如攻读博士学位，钱可以一分不赚，包括工资；活可以一点不干，包括洗袜子。如此诱惑，一根筋的先生却麻木不仁、不为所动。他认为他正在东北财经大学计算中心主任的岗位上，乱事如麻，再去读书，必然是书读不好，工作也受影响（此君果真是丢掉七品芝麻官后才去读的博士学位）。

先生对我的劝学非但纹丝不动，反而倒打一耙，说：“我看你行，你读吧！”当时我感觉先生是在说梦话。我读博士，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出身不好（非名校毕业）、半路出